

清末山西留日学生参加收回矿权斗争述论

□谢忠强 [运城学院 运城 044000]

[摘要]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为了救亡图存,清政府开始大力提倡国人赴日留学。清末新政开始之后,山西籍留日学生人数日益增多且逐渐形成了极其浓厚的民族意识。1905年山西人民收回矿权运动爆发,消息传到日本,山西留日学生积极行动,从致电政府、向民众写公开信、创办报刊撰文抨击出卖矿权的无耻行径,直至李培仁以死抗争及之后的纪念活动,其影响逐渐扩大,最终于1908年取得胜利。清末山西留日学生参加收回矿权的斗争不但维护了国家主权而且还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为资产阶级革命风暴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山西留日学生;收回矿权运动;和平请愿;社会效果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12)04-108-05

清末留日学生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不但是中日两国交流的重要载体和中国新旧文化转型的媒介,更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武力推翻清廷腐朽统治的骨干力量。故而清末留日学生研究向来为史家所关注,然综观目前既有之相关成果,论者多着墨于其在日本留学期间革命思想之传播和酝酿武装反清斗争之努力,而鲜有关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中国留日学生以和平方式参加本国人民反清反帝斗争之专论。在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清末山西留日学生参加收回矿权斗争的相关史实进行初步梳理,以期可以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

1895年清政府最终在与日本的战争中宣告失败,并被迫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消息传开,国人一片大哗。对日战争的结局以“堂堂华夏大邦”败于“东洋倭寇”脚下,有识之士均引之为奇耻大辱^[1]。在战败结局和耻辱烙印无可挽回与避免的时代情境之下,中国的思想、文化界鉴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崛起的不争事实之启发,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研究日本强国之道和向其“师夷长技”的意识倾向。先是清廷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刘坤一等人

上奏请求变革科举、奖励游学,后有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主张借鉴日本的强国模式,极力鼓动光绪帝以国家的名义向近邻日本派遣留学生。最终1898年的8月份,光绪帝在充分认可了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诸多“益处”基础上,颁布上谕,将“鼓励国人赴日留学”制定为“强国之策”^[2]。

其实在清政府制定鼓励赴日留学的政策过程中,除了国内新旧知识分子的强烈呼吁之推动外,日本统治者主动“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鉴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巨大仇恨,尤其是台湾人民持续不断的反日斗争以及“马关条约”条文中所开放之地人民群众对日本的反感情绪,日本政府驻清政府的代表矢野文雄坚信,一旦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形成一定的规模,那么等到中国留学生们学成归国并逐渐成长为清政府的“栋梁之材”的那一天,也就是日本政府不费吹灰之力彻底控制清政府这一宏大目标得以实现的日子了。到那时,日本为中国所培养的军事人才不但会将日本的军制和理念带回中国,还会将军用器材的进口生意也顺理成章地交给日本;同样地,在日本学习工业的学生到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国的工业生命线完全交给日本;而那些在日本学习法政的留学生也必将会“把日本的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国”^[3]。

[收稿日期] 2011-06-3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09YJA770040);上海大学“211工程”第三期项目“转型期中国的民间文化生态”(A.15-A011-09-001)。

[作者简介] 谢忠强(1980-)男,运城学院思政部教师,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生。

很明显,满清政府和日本政府在推动中国学生到日本学习方针的不期而合,促使清末诸多知识分子将“游学东渡”当成了其个人“晋身”的时尚^[4]。受晚清新政开始后全国留学大潮的影响,出生于山西西安的景梅九在1903年考取了清廷派往日本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的名额^[5],实为晋人赴日留学之先驱。为响应清廷留学救国新政之推行,1904年秋山西巡抚加派包括阎锡山在内的“五十名学生到日本留学”^{[6]75}。至此仅历两年而山西籍留日学生即规模渐成。在众多的山西籍留日学生中,虽也有极个别是为其自身前途生计而东渡者,但其中更多的则是虽“身在异国他乡”,但“仍日日心系国家”的有志之士^{[7]68}。与同时期其他省份的赴日学生们类似,晋省留日学生们在国内已经对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和落后现状有了痛彻心扉的感受之后,一下子到了日本,突然感受到了日本社会那种锐意进取、蒸蒸日上、全民奋进的“清新空气”,巨大反差之下,爱国意识引发的愤懑之情油然而生^{[8]155}。为便于更好地升华其救国图存的精神,随着革命思想在东京留学界的广泛传播,山西籍留日学生在政治取向上也大多转向了革命反满。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不久,“中国同盟会山西分会亦在日本东京成立”,由谷思慎任总干事,会员包括荣福桐、景梅九、何澄、阎锡山、王用宾、景耀月等30余人^{[6]77}。中国同盟会山西分会成立后,一面负责组织联络山西籍留日学生的团结,一面又将派人回国推动本省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为其重要旨归。为此目的,1905年冬天同盟会山西分会先后两批派荣炳、阎锡山和赵戴文等人回省发展会员,并筹备编印《晋话报》,以为呼唤全省民众觉醒、团结之喉舌。

毫无疑问,在上述一系列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晋省的在日留学生们早已牢牢地把爱国、救亡的信念镌刻到了自己灵魂的最深处。截止山西人民为挽回本省矿权斗争的声浪传到日本前夕,他们已然具备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而在这种强烈意识的激荡之下,哪怕是一件关乎国家尊严的小事件也会在他们当中“引起轩然大波”^{[8]156},更遑论矿权得失乃事关“山西命脉”之大事乎^[9]。

二

作为一个蕴藏有丰富煤炭矿藏的省份,山西很早就被外来侵略势力当成了霸占对象。英国的“福公司”早在戊戌变法开始之前就诱逼清政府在《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上签了字,从而轻而易举地把包括盂县、平阳府、泽州以及潞安

等地方的矿产开采权牢牢地握在手中,然而由于配套的道路建设没能跟上,英人并没有动手采矿。而当1905年春天晋省商人集资成立本土的采矿公司着手自行开采本省矿藏时,英国的矿物公司也派技术人员到山西进行探矿作业,英方认为当地采矿公司的私自开采作业严重违背了相关协议,单方面向清廷提起抗议,并要求对晋商自办采矿公司进行严厉查处。消息传开,全体山西民众对英国人的无理要求普遍表示反感和愤慨,并逐渐形成了轰轰烈烈的以收回矿权为主旨的抗议斗争^[10]。

国内山西人民收回矿权斗争的消息传到东京,晋省在日留学生们普遍因对外来侵略势力野蛮霸占中国的矿权而感到无比的愤慨,遂纷纷起来声援家乡人民的反抗斗争^[11]。为了确保对事情原委的透彻了解,他们先向山西省相关部门发去专电询问,当了解详情后,他们一面设法联系在清廷中枢任职的晋省官僚,请求他们“为乡人护矿帮忙”,一面正式向清政府外务部提议废除与英方矿物公司的协议^{[12]17}。山西留日学生为了激发山西人民合力争矿,还特意撰写了长达5000余字的公开信。信中首先以激动人心的话语呼吁全省民众奋力一战,誓与英人争矿到底:“此事若争之亡,不争亦亡,与其不争而亡,贻千秋顺民之羞,何如争之而亡,留廿世亡国之念”^{[12]22}。在公开信的末尾,留日学生们还向全体山西人民发出紧急呼吁,一定要全民动员、积极组织,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都要将外来侵略势力霸占的山西矿权夺回来。

除了通过官方途径申诉和用公开信向普通晋省民众呼吁外,山西籍留日学生还努力使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舆论武器与外来侵略势力进行斗争,以更好地团结和组织全体民众参加到保矿运动之中。在了解到清政府打算继续默认英国矿物公司对山西境内矿产拥有开采权的官方态度后,景梅九以全体晋省留日学生的名义在日本神户组织开会,笃定了夺回矿产开采权的决心,“决议派遣学生代表回乡参加斗争”^[13],并先后以笔名“竹崖个人”、“竹崖”、“垒仇”、“者生”、“闷久”、“猛墩”等,在《民报》等杂志发表评论性文章多篇,以反对清政府的出卖矿权行为:“怎么说废约呢,问山西的地是谁的地?是山西人民的。山西的矿在何处?在山西人民所有的地中。山西矿是什么东西?是山西全省人民的共同生活财产。”“唉,我说我们百姓,千万莫要依赖官场,你看中国矿,凡是系外人开的,哪一个不是官场卖了的,凡是系自己开的,哪一个不是民间争回的,地是民间的地,矿是民间的矿,怎么一定要依赖官场与我保守呢?”“唉!全省的矿产,是各省全体人的

矿产,送要全体人送哩,一两个官绅哪儿有送全省之矿产的资格……就是中央政府,也没有够着代毁全国人财产的资格”。景梅九的揭露对晋省矿权问题上官方的丑恶嘴脸的刻画可为入木三分!为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留学生们还专门组织人力写文章专门抨击清政府向英方矿物公司出卖利权的无耻行径,并且面向全体山西商民大力宣传“自办矿产”的爱国思想^[14]。1905年晋省的在日留学生在日本创设了《第一晋话报》,并连载文章,怒斥梁敦彦和盛宣怀等人的卖国行为,借以激励山西民众的斗争意志。第二年,山西留日学生又创办《晋乘》杂志,继续呼吁晋省收回矿权斗争。该杂志自第二期起即陆续刊登了《讨晋人公仇梁敦彦》和《晋人争矿之最后》等战斗檄文,一方面对出卖矿权从中牟利的“家国蠹虫”予以无情揭露,一方面对英方矿物公司的野蛮无理进行严厉地抨击^[5]。

从电报敦促政府到公开信呼吁本省民众,再至连续撰文猛烈抨击出卖矿权的无耻行径以创造舆论压力,山西留日学生参加收回矿权的斗争不断升级,但从斗争的影响范围和实际效果而言均较为有限。留日学生的爱国热情之日益高涨与清廷腐朽的现实反差使得爱国青年们普遍郁闷。1906年10月13日,正在东京政治大学留学之山西阳高籍学子李培仁愤而携两封绝命书投身八重桥下,蹈海而死。

李培仁(1866~1906),1904年考入山西大学堂,1905年冬被选送日本政法大学留学。留学期间受民族危机逼迫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其爱国意识不断增强。根据1906年的《第一晋话报》记载显示,光绪三十二年(1906)10月13日,李培仁在听到外务部电催山西巡抚批准福公司在平定开矿的消息之后,悲愤交加,投身八重桥下,溺水而死。对李培仁之死因,目前史学界尚存在一定的争议。据同时期留学日本之李尚仁所回忆之《山西争矿运动中李培仁跳海的事实真象》和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之《山西大事记(1940~1985)》记载,留日学生说李培仁因争矿而以身殉国,是为了扩大宣传,其《绝命书》系其他留日学生代拟;但李浩所著之《晋矿魂》中则坚持李培仁之死为“以身殉国”。历史结论的不同纷争有时非但不会让后人对其事件本身的历史真实性产生歧义,反而更能加深我们对于某种历史趋向发展脉络的认识。李培仁之死究竟是怎么回事也似乎并不妨碍我们从李培仁的《绝命书》中体会出当时山西留日学生群体在这场反抗斗争中所激发出的资源主权意识。李培仁《绝命书》云:“诚问平孟泽潞之矿产,晋人之矿产,抑政府之矿乎?其果为政府矿产,今日又何必云山西商务局借款

于福公司?若即认为晋人所有,则此矿约之成必晋人认可方为有效。何以出名晋绅未擦印证,在京乡官要有争折,即会试举子亦且联名上书,力陈不可,是当时晋人固全不承认此矿约也,而总理衙门,竟敢据行订立,任意添改,绝秦之案尚存,贿戎之约何效,即至今陈案复翻,死灰复燃,而晋人士庶废约之电函无虑几千百道,始终固未承认。然则得碍于成约者,政府成之耳,非晋人成之也;已成铁案者,政府铸之耳,非晋人铸之也。专办而合办而部分办,不允则不近情理者,乃政府诸公不知受几许贿赂,不如此即无颜以对外人,故不惮蒙洋奴汉奸之羞,而必欲亡我矿产以实其秘密也。我晋人对此惟有权之可争,又何情之可言。……某更欲为我乡宦一言:诸君非有代表全晋之资格者乎?非屡经上书,正大光明,始终不认矿务合同者乎?乃政府诸权要竟敢主持,晋抚亦将附和,其藐视我晋人,剥夺我权利,抑何甚呐!”

李培仁的以身殉矿行为震撼了所有的爱国者。消息一出,整个中国留日学生界为之震惊,各界纷纷悼念响应。李培仁的两封绝命书公开后,留日学生争相传阅,群情激愤。1906年农历10月28日,先由山西留日学生同乡会召开追悼会,11月4日,豫晋秦陇四省在东京神田锦辉馆联合召开规模巨大的追悼会。追悼会参加人数逾千余,中国十八个省的留日学生代表和章炳麟、胡汉民等知名人士均悉数出席。追悼会上,挽联悼词,挂满会堂,气氛极其沉痛,“多有涕泪沾襟不能自抑者”^[15]。会上留学生们筹议了后续争矿的斗争策略,决定将遗书和晋矿档案等刊于内地各报,以扩大影响,坚定争矿斗志,威慑卖矿胆量。其后,山西籍留日学生同乡会公推梁善济、景梅九、王用宾等人为代表护送李培仁的遗体回归故里。11月,留学生代表将李培仁的遗体护送回乡,并在24日于省会太原召开了有三千多人参加的大型追悼仪式。半个月以后,山西平定地区也召开追悼仪式,各界民众数千人出席,其时恰有太原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到该地区为保矿“活动”,他们借着各界民众对李培仁“舍生取义”壮举的无限悲痛,提出“抵制政府继续出卖矿产主权”,“驱逐英人矿产公司”,力争“晋矿晋采”的斗争主题,不失时机地化民众的“悲痛”为斗争的“力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一时间誓死保矿的呼喊在三晋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回荡、盘旋。毫无疑问,留日学生李培仁蹈海事件的发生,激起了全省人民空前未有的愤怒。至此清末山西留日学生参加收回矿权的斗争终被推向了最高潮。

三

清末山西留日学生参加收回矿权的斗争以李培仁蹈海事件为转折,其影响日益扩大。李培仁的绝命书“意在激发国人,坚前途争矿之志”,闻者无不泪下。当时《晋报》载文称“山西煤铁甲于全球,将来为我国经济界绝大利源,今外人必欲攫取,而政府必欲赠予之也,是不独山西生命财产千钧一发,凡我十八省同胞均有利害关系。倘蒙同学诸君拨冗研究此问题,以教我山西人,则甚幸。至李君以身殉命异域,惨痛已极,谅诸君必表同情也”^[16]。文章字里行间情词哀婉,动人至深,社会舆论一片共鸣,甚至就连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人骏和满族权贵恩寿等人也先后表示支持学生争矿。山西各界一致决定向北京外务部交涉,要求收回矿权由本省筹款自办。此后两年间中英双方函电交涉,人员往返,历经多次谈判,最终于1907年终止了与英方矿物公司的协议,至此晋省留日学生的保矿斗争得以胜利的结局告终。

收回矿权运动从1905年爆发至1908年1月20日签订《赎回开矿制铁转运合同》,历时三年,整个过程山西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均贯穿始终,其参与斗争的方式前后共经历了通电政府、致民众公开信、办报抨击卖矿行径乃至以死相抗、掀起群众运动等几个不断升级的演变过程,从其性质分析虽均“未超出请愿的范围”^{[7]240},但其社会效果、政治影响和历史意义却十分耐人寻味。

首先,从其斗争的直接结果而言,清末山西留日学生参加的收回矿权斗争最终夺回了山西省的矿产开采权,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也大力反击了外来侵略者的无耻行径。护矿斗争表达了山西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要求,揭露了清政府丧权辱国的罪行和出卖矿权的罪恶活动,它以其声势之大、参加人数之广开全国保矿运动之先声。保矿运动的胜利,使国家夺回了山西煤矿产权,捍卫了民族尊严,实际上晋矿之争即是全国人民尊严之争更是国家领土主权之争。保晋矿正所以保土地,即所以保人民,实所以保全局也。

其次,从其社会影响而言,清末山西留日学生参加收回矿权的斗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同时也在全国人民当中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反帝爱国教育。在参加收回矿权斗争的过程中,清末山西留日学生更加注重唤醒下层民众的主权意识,无论是其致全省民众公开信中呼吁抗争到底的恳切言辞,还是抨击卖矿行径文章的鞭辟入里,字里行间都深深地流露

着他们对国家主权誓死捍卫的爱国激情,而李培仁的蹈海警世更是在每一个受其事迹感动者心中竖起了一座爱国之丰碑。在这一精神的激励下,非但山西全省各阶层人民群众组成了空前的统一联盟,取得了争矿斗争的最后胜利,继而为以后山西人民开展反帝斗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揭开了全国保卫路矿运动的序幕;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其影响下,各省相继展开赎矿保路运动,且声势浩大、影响深远,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再次,从留日学生运动自身发展的角度考察,清末山西留日学生参加收回矿权的斗争大大提升了所有中国在日留学生团体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晋省留学生此次参加的保矿斗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继1903年拒俄运动和1905年反取缔规则后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体爱国行动。山西留日学生参加收回矿权斗争的早期虽主要以山西留日学生同乡会的名义开展活动,但随着李培仁蹈海事件在中国全体留学生中的影响不断扩大,收回山西矿权逐渐成了全体留日学生心中共同的政治期许。无论是李培仁追悼会上的共同悲愤和感动,还是山西留日学生以其斗争胜利之经验声援后来河南、山东等地争矿运动的历史史实都很好地体现了留日学生的整体意识和统一思想。

最后,从整个中国社会后续的革命发展而言,清末山西留日学生参加收回矿权的斗争显示了他们自身独立的斗争力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促进了反满意识在山西甚至全国其他地方的流行,最终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枪声的打响打下了历史铺垫。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包括山西人民保矿斗争在内的一系列回收矿权的诉求是近代爱国主义发展的重要体现。在挽救危亡的时代话语下,晋省在日留学生们虽然人数和力量都很有限,但他们义无反顾的斗争精神还是集中体现出了晚清新型知识分子们为国为民甘愿牺牲、无怨无悔的高尚情操。

参考文献

- [1] 陈旭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154.
- [2] 陈学恂, 田正平.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3.
- [3] 李喜所. 中国留学史论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220.
- [4] 谢忠强. 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风潮述略[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4): 90-92.

[5] 谢忠强, 刘转玲, 黄红莲. 景梅九留学日本期间革命活动考略[J]. 历史档案, 2010, (4): 113-115.

[6] 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山西大事记 (1840~1985)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

[7] 谢长法. 中国留学教育史[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

[8] 李喜所. 近代中国的留学生[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9] 景梅九. 罪案[M]. 北京: 京津印书局, 1924: 54.

[10] 刘建生, 刘鹏生. 山西近代经济史[M].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7: 356.

[11] 乔志强. 辛亥革命前10年[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 202.

[12] 李庆芳. 山西矿务档案[M]. 太原: 山西晋新书社, 1907.

[13] 景克宁. 书韵[M]. 香港: 金陵书社, 1993: 50.

[14] 景克宁, 赵瞻国. 景梅九评传[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55.

[15] 乔志强. 辛亥革命前的收回矿权运动——辛亥革命前十年史札记之三[J]. 近代史研究, 1981, (3): 203-235.

[16] 汪敬虞.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2辑 (下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745.

On the Struggle for Recovering the Mineral Rights of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of Shanxi province

XIE Zhong-qiang

(Yun-cheng University Yuncheng 044000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Jia-Wu War, in order to save the nation, the Qing Government vigorously promoted people to Japan to study.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politics, the number of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of Shanxi increased, and gradually formed a very stro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Shanxi People's Movement to recovery of mineral rights broke out in 1905, when the news reached Japan, students from Shanxi took an active part in it. They called the government, wrote an open letter to the public and delivered articles to criticize the shameless acts of giving up the mineral rights. And because of the Li Peiren's death, more and more people joined the struggle, and at last they won the struggle. The students' struggle for the mineral rights not only protected the national sovereignty but also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oming storm of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Key words Shanxi students in Japan; movement to recover the mineral rights; peaceful demonstrations; social effects

编辑 张 莉